

最严禁塑令调查(下)

塑料替代材料之辩：从奶茶纸吸管说起

纸吸管：环保之外多吐槽

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目前，蜜雪冰城、Coco、奈雪的茶、喜茶等奶茶店都开始提供纸吸管。有奶茶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顾客点单时，默认设置是提供纸吸管，只有顾客提出需求才会找可降解塑料吸管。

消费者是否接受使用纸吸管？北京商报记者通过问卷星平台随机发放了200份调查问卷，问卷结果显示，仅有23%的人倾向于选择纸吸管，64%的消费者倾向于选择可降解塑料吸管，48.5%的消费者选择了传统塑料吸管，5%的消费者则选择不要吸管。

在谈到纸吸管的使用体验时，有消费者评价道：“总觉得味道不对，而且得快喝，总怕纸吸管一会儿就软了”“扎不开，喝到一半有纸味儿，影响口感”“不卫生”“担心纸会融化在饮料里”……针对纸吸管的吐槽不绝于耳，与此同时，还有40%的消费者表示，曾经在点单时选择塑料吸管，收到时却是纸吸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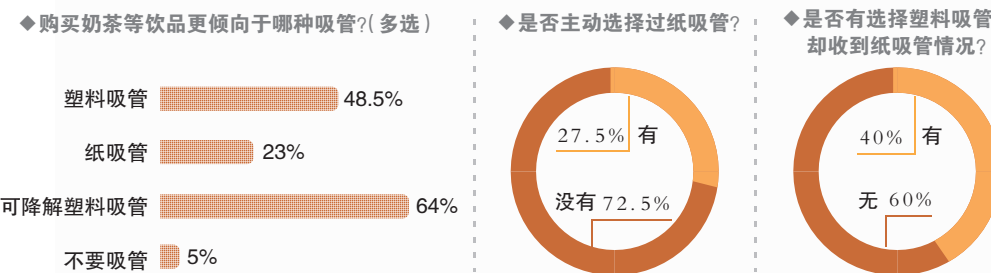
目前市场上的纸吸管有无质量差异？北京商报记者从一家为纸吸管厂提供原材料的纸业公司了解到，纸吸管制作过程中使用食品级的纸，用胶水黏合；我们这边木浆和竹浆的纸都有，不同厂家选的材料不同质量自然会有差别，根据客户需求不同，好一点的纸1万块钱一吨，差一点的纸5000-8000块钱一吨。

从事纸吸管生产供应的李先生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他的公司使用食品级牛皮纸，从不同纸厂进货质量上会有一定差异；欧美进口质量会稍好一点，东南亚进口质量会差一点。贵一点的17000-18000元的都有，便宜点的也有11000元左右。东南亚的进口纸比国产的价格还会低一些”。

“纸和塑料相比最缺的是两样性能，一样是阻隔性，一样是热封性。”中国造纸研究所研究开发部副主任张红杰在接受北京商

开启限塑之路13年后，在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严禁塑令”下，纸制品、可降解塑料制品在餐饮、外卖、超市等多领域实现替代应用。北京商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消费者对奶茶店使用纸吸管的安全卫生问题不无担忧，而可降解塑料制品的处理如何达到环保目的也仍存疑。有专家认为，由于前端分类不精细、产品类型不一，可降解塑料难以完全得到降解处理。与此同时，纸制品及可降解塑料相关产品质量检测方法和标准体系也亟待建立。

消费者购买奶茶使用吸管情况



数据来源：北京商报调查问卷

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纸吸管已经发展了几代，以前的纸吸管是用专门的胶水进行黏合，所以会存在口感不好，吸管形状稳定性不好、有怪味的问题。现在研发出的新一代纸吸管会好一些，使用另一类高分子材料作涂料，具备一定的热封性能，在一定的加热条件下具备黏合能力。现在市场上两种纸吸管都有，新型的吸管在江浙一带已经使用，一般是三层纸，由专门的机器卷出来。”

可降解塑料：回收处理是重点

除了纸制品，可降解塑料也是传统塑料的重要替代产品。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当前的垃圾分类情况下，除了塑料瓶多作为可回收物进行回收之外，塑料袋、餐盒、奶茶瓶及吸管等大量垃圾仍在按照“其他垃圾”进行处理。现在前端的收集分类还没有精细化。首先塑料就没有实现单独的收集分拣，此

外，塑料里面哪些是可降解的，哪些是不可降解的，也没区分处理。”国家城市环境污染防治技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彭应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具有环保优势的可降解塑料是否需要更精细的回收体系和特殊的降解条件呢？不同专家给出了不同看法。

“实际上只要进入垃圾收运系统，生活垃圾焚烧后污染物的控制都是严格执行垃圾焚烧标准的，可降解和不可降解塑料的影响区别不大；在填埋方式下，可降解塑料能够被环境消化掉。如果没有进入垃圾收运体系，而是进入水体、土壤等环境中，可降解塑料也会慢慢得到降解。”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蒋建国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一位从事环保减塑工作多年的相关人士则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目前可降解塑料以可工业化堆肥塑料居多。这种类型的降解塑料被丢到自然环境中并不会魔术般地降解消



失，它需要先进行配套的分类回收，然后在恒温恒湿严格控制的工业堆肥条件下进行后端处理。

“如果每一个生产商的产品降解条件不一，监管不到位致使产品可能混杂一些不能降解的材料，都有可能影响堆肥降解。”另一位环保人士小卢也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

中国循环经济协会会长、中关村国际绿色产业服务创新联盟常务理事朱黎阳也表示，可降解塑料的性能和概念的混淆一直存在，市场上相关产品也鱼龙混杂，所以相关产品的质量检测方法和标准体系亟待建立且尤为紧迫，特别是可降解塑料产品定义、分类、性能评价指标、产品认证标准标识等亟待完善。

13年限塑：严格政策是大势

近年来，我国以绿色、循环为发展目标

企业层出不穷。2019年成立的浙江植物源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植物源公司”）正好赶上了最严禁塑令的实施。“这对我们确实是个机遇。”植物源公司销售总监汪玲恩告诉北京商报记者：“公司在成立时，正是看到了国家对禁塑令严格落实的决心。虽然最初没有订单的时候也着急，怕市场不能接受，但随着与几个大公司的订单逐渐稳定，公司也渐渐走上了正轨。”

“国家的禁塑令是一步一步落实的。现在各大原材料企业都在扩产，我们更希望未来原材料的价格保持稳定，使生产厂家和消费者都能接受，并且主动提高环保意识。”汪玲恩说。

2008年6月起实施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是我国最早的限塑令，要求在所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从塑料购物袋到塑料吸管、快递包装等更多类别的政策限制，中国的限塑之路已经走过了13年，国内上下的限塑意识也在不断提升。

2019年，小卢选择做减塑相关项目推进和政策倡导工作。她发现，在做企业倡导时，一些企业会以比较公关的方式回应社会组织的诉求：“企业会考虑到成本和盈利，这跟环保会比较难平衡。”让她惊讶的是，她曾给政府部门留言询问塑料制品的消耗量等相关数据情况，在5天内就接到了相关部门的电话反馈。政府在相关议题上的开放和重视让她印象深刻。

“十多年来，限塑令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超薄塑料袋、超薄塑料地膜这类影响比较大的塑料的使用，但是更多的一次性塑料包装、餐具等，使用的领域仍很大，今年更严格的政策也是国际大环境和我国环保趋势使然。”蒋建国说。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吕银玲/文 CFP/图

西街观察 Xijie observation

黄峥急流勇退背后：平台拐点已至

韩哲

不惑之年，黄峥选择辞去拼多多董事长一职。市场一片错愕。在此之前，他已经一让CEO，二让首富，如今三让董事长。上一个有着如此谦谦之风的人，还是小说里三让徐州的刘备。

从披露的信息来看，黄峥不像是退居幕后、垂帘听政。从放弃超级投票权来看，他应该是全退，而不是半退。

但恐怕没人否认，作为创始人的黄峥，对拼多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倘若拼多多日后出现联想或携程式的危机，也不排除他以柳传志或梁建章的方式回归。

截至2020年底，拼多多的活跃买家数量达到7.88亿人，同期阿里巴巴为7.79亿人，京东为4.72亿人。

后来者居上，但三代人殊途同归。“60后”的马云退而不休，祸从口出；“70后”刘强东被迫退居幕后，在帷幄之中运筹；“80后”的黄峥事了拂衣，“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无人知道他的内心是如何想的。也许如他所说，将结合个人终身兴趣，致力于食品科学和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也许是这个来自水软风清江南的杭州人，嗅到了瓶颈。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以及离开。蒙眼狂奔了两个十年的互联网大厂意识到，平台的拐点已至。

一方面，多年来，平台与资本互为犄角，攻城略地，在带来市场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无序扩张。创新与秩序的博弈一直都在，直至去年，这个平衡被打破，“二选一”“灰犀牛”风险、信息过度攫取等平台问题，被前所未有地聚焦。

官方一锤定音，“我国平台经济

发展的总体态势是好的、作用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些平台企业发展不规范、存在风险，平台经济发展不充分、存在短板，监管体制不适应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简言之，就是平台需要做出改变。监管因为创新而迁就平台的日子渐行渐远，拥抱监管是新常态。

另一方面，被中国市场滋养、以中国市场见长的平台大厂，也面临着一个流量见顶的拐点。中国市场再庞大，人口红利也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以前是靠着“烧钱”来抢占市场、规模和流量，高增长带来高估值。而当互联网消费增速放缓，互联网渗透率封顶，蓝海变红海，产品创新和精细运营就成为大势所趋。好赚的钱都已经赚了，认知范围内的钱都已经发现，接下来的，是窄门和窄路。

这一点，黄峥也心知肚明。他在致股东信中说，“行业竞争的日益激烈甚至异化让我意识到这种传统的以规模和效率为主要导向的竞争是有其不可避免的问题的”。

三年来，我们深刻认识到，终极竞争是科技的竞争。众多的技术集合在一起，创造出了我们称之为经济的东西。经济是技术的一种表达，技术进化引发经济进化。

平台不能再继续躺在底层技术上“坐享其成”了。人们对平台的要求更高，从大到伟大。

人各有志。选择都是个人的，有所为有所不为。至少，我们在过去的五年，在拼多多崛起的日子，我们目睹过少年英姿，“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预付费屡“埋雷” 北京拟推健身办卡7天冷静期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阮航达)

3月16日，北京市体育局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新修订的《北京市体育健身行业预付费服务合同》公开征求意见。本次修订中的几个新变化，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合同第五条的“7天冷静期”。其中写明，办理健身卡后的7天冷静期内，若消费者未开卡使用，有权无条件解除合同。相较上一版，此示范文本还对退款时间进行了明确，即商家确认消费者退费后，要于1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退还全部预付费用。此外，示范文本中特别提示：“双方可协商采取‘年会员(月/季)缴费’等方式”，以避免长时间、大额度预支消费的风险。

关于预付费问题，示范文本还对可能出现的纠纷情况进行了退费和责任约定。其中写明，经营单位若在合同有效期内存在擅自变更服务地点、提高承诺的服务价格、缩短休闲

健身卡的有效期限、减少承诺的卡内包含项目、关闭单店休闲健身卡所属门店、增加休闲健身卡使用的限制条件等严重影响甲方利益行为的，双方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消费者也可以解除合同，并要求乙方在扣除已消费金额后，一次性退还预付费余额。

预付费问题不是新鲜事，有关引导文件也早已出台。例如2011年12月1日，北京市工商局就启用了《北京市休闲健身行业预付费服务交易合同》，旨在剔除健身行业的“霸王条款”。但北京商报记者在询问部分健身房办卡事宜时，销售人员往往并不会主动提及。各家健身房情况也各不相同，有的健身房表示无法退费，有的则表示开卡3个月也可以退费，消费者还需要具体咨询确认才行。

示范合同虽然不是强制规定，但依然有法律价值。北京卓纬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志峰在

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民法典》510条规定，当事人合同未约定或约定不明确，且未补充协议的，可按照相关合同条款及交易习惯确定。而大量的司法判例是将政府机关颁布实施的示范合同作为交易习惯，在双方合同约定不明情况下作为解释合同或规范当事人权利义务的重要依据。”

示范性合同重点的条款往往也标示了政府机关监管的重点方向，也可能作为将来政府机关立法或向立法机关建议立法的重要基础。孙志峰介绍说，2019年北京市监局等7部门向社会公开了《关于加强预付费式消费市场管理的意见(征求意见稿)》等7份文件，很多内容也体现在了示范合同文本之中。消费者遇到纠纷时，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的意见》《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等规定维护合法权益。

清明假期怎么过？中疾控详解疫情防控形势

北京商报讯(记者 陶凤 常蕾)全国已连续29天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即将到来的清明、“五一”假期，大家可以放心出游吗？3月1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冯子健接受央视采访，对于下一步的疫情防控形势进行了详细解读。

对于当下的疫情防控态势，冯子健指出：“北京防控新规里的有序开放看起来松了，但是防疫却更紧了。”冯子健表示：我们在防止输入，特别是在防止输入以后引起疫情本土传播的“早发现”上、在发生疫情之后的有力防控、精准防控上，要付出更多努力，要保持高度戒备和有准备的状态。”

具体来看，一方面是防止输入，在边境的管控方面，包括入境人员的筛查、医学观察、隔离这些措施，入境的货品、物品检测，相关人员的健康监测等措施，都要做的更严谨、严密。另

一个是医疗卫生要保持更高的敏感性，保证能够及时发现输入病例和输入病例引起早期的疫情，一旦发现要做出快速的反应。冯子健称，现在仍然要保证整个工作体系高度戒备的状态，做好早发现、早控制、精准控制。这样的话使每起疫情的控制时间非常短，涉及的范围尽可能的小，对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的干扰和影响也尽可能小。

清明、“五一”假期将至，可以出游但不意味着可以丢掉防疫。冯子健提醒：大家不要忘记现在全世界还处在新冠病毒流行的阶段，境外输入风险依然存在，所以我们还要绷紧防范疫情传播这根弦。”

除一米线、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外，冯子健指出，接种疫苗是预防新冠肺炎最好方法。“疫苗已经证实对防范新冠疾病有非常好的保护作用，尤其是未来我们要在全球范围内真

正克服影响，最终还是要靠大量的、越来越高比例的人们都接种上疫苗。”冯子健说。

持续一年多的新冠疫情到底何时能结束，大家何时能回到曾经的生活状态？冯子健表示：这主要取决于我们人群免疫水平建立的时间，对我国来说，因为我们没有经历大量自然的感染，整个国民的感染水平非常低。我国要想使疫情不再对我们造成严重影响，一定要靠普遍接种疫苗，当我们国民有非常高比例的人都接种上了疫苗以后，那么我想疫情的严重影响就可以得到非常有效的克服，我们可以大体上回到准常态的状态。”

疫苗专家陶黎纳也向北京商报记者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我们国内目前虽然疫情控制的很好，但是要完全恢复常态，还是离不开疫苗。而且我国人口数量庞大，其实如果要想全民接种，建立起庞大的免疫屏障并非易事。”